



顺应论与口译研究

A Study of Adaptation Theory
in Interpreting

龚龙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顺应论与口译研究

龚龙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顺应论与口译研究 / 龚龙生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1110-762-3

I. 顺... II. 龚... III. 口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7475 号

顺应论与口译研究

龚龙生 著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刷: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mm×230mm

印张:12.75

字数:221千字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ISBN 978-7-81110-762-3

责任编辑:赵光莹 谈菁

装帧设计:闻静 李军

责任印制:韩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5106311

自序

21 世纪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全球化的态势,随着国际性学术交流的蓬勃发展,口译作为各领域内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桥梁,在当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口译研究和教学也方兴未艾,并有蓬勃发展之势。口译研究和语用学、心理学、社会学、翻译学、认知学等各学科广泛结合,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在口译过程中,译员作为交际双方的中介,必须根据发言人与受话者的话意在理解的基础上选择双方合适的语言表达习惯,使译语再现源语的所有意义,达到双方顺畅无阻的交际目的。本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去研究口译。根据比利时国际语用学秘书长 Jef. Verschueren 在其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中提到的顺应论(Theory of Adaptation),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人类语言是可以选择的,口译语言要进行选择才能恰当地表达源语意义。协商性则要求口译的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转译源语,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下做出的选择,使译语适合现场语境、双方的可接受性等。译语要顺应语境因素,顺应源语的语言结构成分,顺应口译的动态过程,而且这一顺应选择是有意识的认知过程。本研究根据顺应论所提出的语言的三大特征,从语言环境、非语言环境两大类来探讨、理解如何实现口译中语境关系的顺应,更好地提高语言使用的质量,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本书从顺应论的角度,分析了口译过程中语境的适应。第一,顺应语言环境。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只有把握住语言环境,选择合适得体的词,符合语言环境在语音、语义、语法上的要求,才能准确地传达讲话人的意图和话语信息。第二,顺应非语言环境。其中主要是顺应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和物理环境(情景环境)。在文化交流性很强的口译活动中,口译员需要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口译进程中应选择得体的策略来实现文化语境的适应,达到双方交际的目

的。同时,口译又是个场合性很强的工作,而且涉及内容范围广,所以口译译员要根据不同的口译场合,顺应情景环境。

作者尝试证实顺应论与翻译和口译的密切关系及语言的选择和语言的顺应是互不可分的。正如顺应论所指出的翻译是连续不断选取的过程。口译的语言只有选择才能适合源语意义,只有顺应译语才能是得体的。

作者以问卷调查、访谈与现场口译有声资料为案例,根据顺应论的概念、原则对口译中的语境适应进行了探讨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对具体案例进行了剖析,并发现被调查者均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在口译活动中应用了顺应论的原则、策略,并注意到外语水平越高的译员、学生,其应用顺应论的频率越高。

总之,本书尝试从语用学及跨学科的角度探讨顺应论在口译活动中的应用与价值,对其概念、原则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为翻译,尤其是口译的理论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所列的实际例证,对口译研究与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作者

二〇一〇年三月

于上海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	3
第二章 口译研究纵观	6
第一节 导言	6
第二节 口译研究的历史背景与特点	7
第三节 西方口译研究的特点	14
第四节 口译理论研究的宏观框架及研究方法	16
第五节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17
第六节 中国口译理论的研究现状及主要特征	19
第七节 释意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2
第八节 认知—负荷模型	29
第三章 Verschueren 与顺应论	38
第一节 导言	38
第二节 语用学传统研究的回顾	39
第三节 顺应论的理论基础	41
第四节 顺应论的内容	43

第五节 顺应过程意识突显性	49
第六节 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角度	49
第七节 Verschueren 对话用学的贡献	53
第八节 顺应论在中国的研究	54
第九节 我国顺应论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58
第四章 顺应论与翻译	60
第一节 导言	60
第二节 顺应与翻译	62
第五章 顺应论与口译	71
第一节 导言	71
第二节 顺应论在口译中的作用	72
第六章 顺应论在口译中的应用	136
第一节 导言	136
第二节 调查研究过程	136
第三节 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137
第七章 研究的结论、意义与展望	161
第一节 内容回顾	161
第二节 创新与不足	164
第三节 研究展望	165
参考文献	167
附 件	188
一、学习者问卷调查	188
二、教师访谈问卷	192
三、现场口译调查	19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历史上对于口译的研究相对较少,一部分是因为口译工作时的言语均依附于转瞬即逝的语言声波载体,从而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大量的直观资料供后人开发、研究,甚至就连口译员工作的存在也往往依据笔语对口译的记载而间接予以证实。

虽然对口译的研究少,但是其历史悠久。当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需要交流时,他们会借用手语(sign language)或求助于会讲这两门语言的人。这些人有些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有些可能生活在两国的边境或其父母母语不同,还有一些人因为到某一国家生活而学习了第二外语。

口译在新大陆的殖民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时,他们并不会说美洲、亚洲或非洲人的语言。本地居民在数量上超过殖民者,欧洲人想获取权利或控制当地居民,语言交流是关键。哥伦布返回西班牙时曾选派了六名印第安人,让他们学习西班牙语,以便在他返回美洲时能充当口译员。当时哥伦布深信,“在西班牙学习西班牙语,这比在当地教殖民者学西班牙语进步快、收效大。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翻译人才”(艾赫贝尔,1982)。

1919 年被视为西方口译史上的转折点。1919 年之前,法语一直是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的唯一语言。1919 年巴黎和会的召开打破了法语的垄断地位,会上借助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进行谈判。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不会讲法语,需要口译人员进行口译。这就是会议口译的起源(Phelan, 2001)。从此,口译成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职业。

20世纪20年代,现代同声传译设备的发明被认为口译史上的另一转折点。同声传译设备的发明者是商人爱德华·费林(Edward Filene)、电器工程师乔丹·芬雷(Gordon Finlay)和当时IBM总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1927年,日内瓦举行国际劳工组织会议(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onference),同传设备首次使用。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直至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口译员才能使用英、法、德、俄四种语言进行同传。之后,参加审判的一些口译员仍继续在联合国任职,其中就有口译鼻祖级人物艾赫贝尔(Jean Herbent)。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随着各种国际组织的大量出现,市场对快速有效的语言转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如果说第一批会议口译员是机缘巧合才成为口译员,他们会讲一种或多种外语,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机担任了口译员。那么此后,随着口译需求的增加,各种翻译训练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立项并发展起来,学校开始教授相关课程并提供平台以帮助学员获得口译职业资格。

1940年,瑞士日内瓦学院(Geneva School of Interpreting)成立。1943年,奥地利维也纳口译学院(Vienna School of Interpreting)成立。1949年,美国乔治敦大学翻译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 Division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成立。1953年,国际会议口译协会(AIIC—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成立。1957年,巴黎高级口译笔译学院(ISIT—Institut Supérieure d'interprétation et de Traduction)和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Ecole Supérieure d'Interpretes et de Traducteurs)成立。1965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语言学院(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School of Language)成立。1967,瑞士苏黎世口译学校(Dolmetscherschule Zurich)成立。1968年,美国蒙特利翻译学校(Monterey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成立。

翻译学院的成立、课程的开设标志着口译学术研究的开始。参照吉尔的分析,西方口译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初级研究阶段(Pre-research Period);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阶段(Experimental Psychology Period);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从业人员研究阶段(Practitioners' Period);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蓬勃发展阶段(Renewal Period)。

在口译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口译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信息处理模式(Information-processing paradigm),指借用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模式,注重研究源语和译语间的信息传递,将源语的语法结构视为造成处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代表人物有杰弗(Gerver)和朗博(Lambert),其中杰弗提出了最早的同声传译全过程模式。(2)释意派理论(Theorie Du Sens),以塞莱丝柯维奇和勒代雷为代表人物。(3)口译神经生理学研究(Neurophysiological Approach),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意大利的特里斯特大学为主进行的研究,特里斯特大学由于在口译界的地位和多产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是神经生理学家法博罗(Fabbro)和会议口译员兼口译教师葛兰(Gran),主要研究口译时译员脑神经的反应,以及译员脑组织的偏侧性(Lateralization)。(4)跨学科实证研究(The General Empirical Interpreting Research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put),是当今最流行的口译研究视角,指并不遵循单一的某种范式,而是结合其他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对口译进行实证研究。法国的吉尔教授(Daniel Gile)是跨学科实证研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口译界目前最为多产的作者,从事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他最受瞩目的成就之一是他借用认知科学概念创立的口译认知—负荷模型(Effort Models,又译作“多任务处理模式”)(刘和平,2005a)。另外,从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视角研究口译以及从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Text-linguistic)视角研究口译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二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

“口译行为是一种语际翻译行为(explanatory act),它的根据是源语的语言符号化表现,通过对语言符号化表现的解释获得对源语意义的理解”(刘宓庆,2004)。口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传播”(刘宓庆,2004),其研究难度远远大于笔译。因为笔译的载体一般是可长久保存的纸张、电子文档等,便于研究人员考察研究。而口译则因其言语附着于转瞬即逝的声波载体而难以留下大量的直观资料供后人研究参考,这无疑增加了研究难度。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口译研究起步晚、层次低,在中国的译学构架中的地位一直微不足道。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主要翻译和外语刊物有零星几篇关于口译的文章发表,但是中国学者对口译研究的初步认识和探索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口译的特点及技巧进行

论述,属于经验谈和问题陈述阶段,1996年前发表的涉及口译的论文不足50篇(黎难秋,200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口译研究发展迅速,开始呈现开放型跨学科研究的态势。但是,口译研究在国内仍未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

其次,口译理论研究大多缺乏实证支持。胡凌鹄认为:“目前中国口译研究虽然已逐步摆脱了初始时的‘经验谈’的束缚,但仍处于归纳一般性理论的阶段,而且其中很多理论的归纳是完全以经验为基础的。……如果要把口译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就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蔡小红,2002)。对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更缺乏口译技能系统训练的理论研究(蒲艳春,2004)。

针对口译宏观研究粗放、乏力的现状,笔者认为研究者应更多地着眼于口译理论的宏、微观创新,口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紧密相连,因此,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进行口译的学科“交叉性”研究将有益于口译宏观的、系统的理论构建,从而避免“空对空”的理论思辨或“宏而无实”的理论空架。在口译研究中,我们不仅应重视对传统的审视,而且还要博采众长、立意于开拓,摆脱主观臆断,加强理论的宏观整合。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必须基于科学性的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基础,学科的发展也就只能停留在表层,无法深入,口译也不例外。如何在理论上为口译研究提供基础?如何克服已被人们广泛研究的口译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提出更为合理,且符合口译特性的理论?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文献评述的前提下,梳理一些基本理念。同时,在分析相关调查访谈结果的基础上,探讨顺应论(Theory of Adaptation)在口译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口译过程中,译员作为交际双方的中介,必须根据发言人与受话者的话意并在理解的基础上选择适合双方的语言表达习惯,使译语再现源语的所有意义,达到双方理解上顺畅无阻的交际目的。本研究尝试从语用学的角度去研究口译。根据比利时国际语用学秘书长 Jef. Verschueren 在其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中提到了的顺应论(Theory of Adaptation), Verschueren 认为,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人类语言是可以选择的,口译的语言要选择才能合适地表达源语意义。协商性则要求口译的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转译源语,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下做出的选择,使译语适合现场语境、双方的可接受性等。从语言的顺应性出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译语的选择,即译语要顺应语境因素,顺应源语的语言结构成分,顺应口译

的动态过程,而且这一顺应选择是有意识的认知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根据顺应论,从语言环境、非语言环境两大类去讨论、理解如何实现口译中语境关系的顺应,更好地提高语言使用的质量,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本研究旨在从顺应论的角度,分析口译过程中语境的适应。第一,顺应语言环境。在口译实践中,译员如能把握语言环境,选择合适得体的词,符合语言环境在语音、语义、语法上的要求,才能准确传达说话人的意图和话语信息。第二,顺应非语言环境。其中主要是顺应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和物理环境(情景环境)。在文化交流性很强的口译工作中,口译译员需要有很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口译过程中应选择得体策略实现文化语境的适应,达到双方交际的目的。同时,口译又是场合性很强的工作,而且涉及内容范围广,所以口译译员要根据不同的口译场合,顺应情景环境。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与现场口译所获得的有声资料及口译文本为案例进行研究。但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属于定性研究,根据 Verschueren 的顺应论展开具体分析,尝试用语用学的理论来分析口译过程,并同时提出提高译员在不同口译场合语体的顺应选择及语体选择意识培养的重要性,抛砖引玉,从而进一步深入、完善口译研究理论,推动我国口译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具体情况为:问卷调查主要针对在校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非学历高级口译培训班的 150 名学生,旨在了解他们对口译理论的了解程度、看法及他们在口译过程中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顺应论的状况。访谈调查主要针对老、中、青三类口译教师对发展、研究口译理论的观点以及应用顺应论进行口译的能力层次。现场实例调查 30 位参加“上海市高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的考生的考试现场录音,察看考生在口译现场应用顺应论策略的频率与可行性。

第二章

口译研究纵观

第一节 导言

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正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种趋势必将引起对口译这种即时、高效的语言服务的巨大需求,对口译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口译人才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00年5月将口译课列为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有些学校早已开始在研究生阶段培养专业口译人才以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口译人员的需求。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然而,由于口译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以及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的相对滞后性,国内的口译教学和培训远远跟不上时代步伐,口译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显得异常突出。同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力量较薄弱。

口译在中国的译学构架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薄弱环节。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主要翻译和外语刊物有零星几篇关于口译的文章发表(胡庚申,1989),中国学者对口译研究的初步认识和探索基本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口译的特点及技巧进行论述,属于谈论经验和问题陈述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口译研究发展迅速,开始呈现开放型跨学科研究的态势(刘和平,2001a),但是其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今天中国的翻译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口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时代的需求呼吁适合中国国情的口译理论的推陈出新。

第二节 口译研究的历史背景与特点

一、口译的历史

口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在漫长的人类原始社会,原始部落群体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属于一种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显然阻碍了人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各部落群体便产生了跨越疆域、向外发展的愿望,产生了同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要。语言不通显然成了影响这种跨民族交流的最大障碍,而口译作为中介语言媒介可以使人们与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愿望得以成为现实。于是,构筑人类跨文化、跨民族的交际活动的桥梁——双语种或多语种口译便应运而生。

数百年来西方各国虽然也有专司口译之职的人员,但是大部分的译员都是临时的兼职人员。口译作为一种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职业,始于一战末期。1919年的“巴黎和会”首次打破了法语在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中的垄断地位,而借助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进行谈判。“巴黎和会”的组织者招募了一大批专职译员,他们以正式译员的身份为“巴黎和会”做翻译。“巴黎和会”结束后,这批译员中的不少杰出人士陆续成了欧洲许多翻译学院和翻译机构的创始人。从此,口译的职业性得到了认可,口译基本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开始受到重视,职业口译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张维为,199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战犯审判的口译工作采用了源语、译语近乎同步的方法。以“同声传译”为标志的新的口译形式的出现使人们对高级口译的职业独特性刮目相看。随着联合国的创立、各类全球性和地区性组织的出现,国际交往日趋频繁。20世纪50年代,各种国际组织的大量兴起,对快速有效的语言转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于是各种口、笔译训练项目如雨后春笋般首先在欧洲建立起来,口译研究也开始起步。国际会议职业译员的地位越来越高,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高级译员组织,“国际会议译员协会”,在日内瓦隆重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口译作为一门学科,对其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高等学府。半个世纪以来,高级口译人才一直受到各类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各种跨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青睐。专业口译已成为备受尊敬的高尚

职业,尤其是高级国际会议译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领域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优秀口译人员成了国家紧缺人才。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自此我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对外开放的国门也越开越大。在东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陷于衰退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列车仍以其强劲的活力,沿着通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的轨道继续高速运行。中国,一个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成了许多海外投资者和观光客的首选目标。一个以稳健的步伐走强国之路的全面开放的中国,对外交流的接触点越来越多,接触面越来越大。各类口译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高级译员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日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一大批合格的专职或兼职译员来共同构筑和加固对外交往的桥梁,今日的翻译界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对口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口译研究也在丰富着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如心理语言研究、话语研究、双语研究和翻译研究)。

二、口译的定义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或读到)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交际行为,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手段。

人类的口译活动不是一种机械地将信息的来源语符号转换为目的语符号的翻译活动,而是一种积极的、始终以交流信息意义为宗旨的、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翻译活动。因此,口译不是孤立地以词义和句子意义为转换单位的单一性语言活动,而是兼顾交际内容所涉及的词语意义、话语上下文意义、言外寓意、语体含义、体语含义、民族文化含义等信息的综合性语言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译不仅仅是语言活动,而且还是文化活动、心理活动和社交活动。

译员必须掌握两种语言(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口译所需的双语知识和双语能力仅仅是口译的语言基础。口译依赖双语符号系统的有效转换以传递信息,保持交际双方信息渠道的畅通。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存在着种种非对等性,语言符号的有效转换不仅涉及一个人的语言知识,而且还涉及这个人的语言解意能力、反应记忆能力、信息组合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文化背景知识。

三、口译的特点

口译是一项很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口译是一种具有不可预测性的即席双语交流活动。口译人员需要在准备有限的情况下,即刻进入双语语码切换状态,进行现时现场的口译操作。有些口译场合,如记者招待会和商务谈判,口译话题千变万化,往往难以预测。译员或许可以通过事先确定的交谈主题来预测交谈各方的话题,但是,译员的任何估计都不可能是充分的,而且主观预测也是靠不住的。此外,交际各方都希望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能将信息迅速传递给对方。但由于在语言不同的交际双方之间介入了一个“传言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表达的连贯性和接收的快捷性。因此,交际双方都希望作为交际中介的译员不要过多地占用他们的交谈时间,尽可能做到快捷高效。这就要求译员具有高超的即席应变能力和流利的现时表达能力。

第二,现场气氛压力。口译场面有时非常严肃庄重,如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正式场合的严肃气氛会给经验不足的译员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的情绪会影响译员的自信,怯场的心态会使译员口误频生,瞬息万变的现场气氛会使译员反应迟钝,从而影响口译水平的正常发挥。一般来说,如实反映口译现场的气氛和主题是口译的基本职业规范。交际现场气氛无论是热烈的,还是沉闷的,无论是严肃的,还是随和的,交际信息都不应该因译员不恰当的过滤而受到损失。

第三,个体性操作,责任重大。口译活动具有很强的独立操作性。通常,译员在整个口译过程中基本上是孤立无援的。译员必须独立处理可能碰到的任何问题。有些问题属语言类,与译员的双语知识有关;有些属文化传统类,与译员的民族知识有关;有些属自然科学类,与译员的学科知识有关;更多的属社会学类,与译员的社会、文化、国情、时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有关。译员无法回避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在口译过程中,译员不可能查询工具书或有关参考资料,也不能频频打断说话者,要求对方重复自己所讲的内容,解释其中的难点。译员要对自己的口译负责,不可“自圆其说”。译员应该认识到,“译(一)语既出,驷马难追”。自己的译语,随意不得。有些场合口译出错,还可期望在以后起草书面协议时予以纠正。然而许多口译,如国际会议口译,没有后道工序的补救机会(梅德明,2006)。

第四,口译是一种综合运用视、听、说、写、读等知识和技能的语言操作活

动。“视”是指译员须具有观察捕捉说话者的脸部表情、手势体姿、情绪变化等非语言因素的能力。“听”是指译员能够耳听会意各种带地方口音以及不同语速的话语能力。“说”是指译员能用母语和外语进行流利而达意地表达的能力。“写”是指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快速笔记的能力。“读”是指译员在视译时快速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口译属于一种立体式、交叉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多层次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既给口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说话者浓重的地方口音和过快的语速给译员带来的耳听会意的困难,同时又为口译工作创造了颇为有利的条件,如说话者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生动直观的体语表现、现场各种与口译内容有关的景物,所有这一切都是辅助口译的有利条件。

第五,口译中信息交流的内容包罗万象。职业译员的口译范围没有界限,内容可以上至天文,下及地理,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毋庸置疑,口译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口译要求译员有扎实的语言知识功底、流利的双语表达能力和娴熟的转译技能,要求译员成为一名语言专家和交际能手,这并非一日之功。然而,这些仅仅构成译员的语言基本功。由于口译的服务对象是各界人士,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在交际过程中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表达出来,这是译员无法回避的现实。当然,无人能够精通百家,博晓万事,无人能说自己对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是,口译内容的繁杂无限却是不争的事实。译员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一名既精通语言的专家,同时又是通晓百事的杂家。

四、口译的标准

口译的标准,完全套用笔译的“信、达、雅”三原则是不恰当的。口译不同于笔译,口译的“现时”、“现场”、“限时”的特点决定了口译的标准有别于笔译的标准。衡量口译质量的基本标准应该是“准确、通顺、流利”。

首先,口译必须“准确”。准确是口译的灵魂,是口译的生命线。“准确”要求译员将源语这一方的信息完整无误地传达给目的语一方。具体说来,口译的准确涉及口译时的主题准确、论点准确、风格准确、词语准确、数字准确、表达准确、语速准确以及口吻准确等方面。归根结底,准确的译语应该同时保持源语的意义和风格。准确的口译不仅是双语成功交际的保障,而且也是译员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的集中体现。必须指出,我们所讲的准确性并非是那种机械刻板的口译。“通顺”要求译员能用目的语流畅地传达源语的信息。译文需要符合受众的语言规则与习惯,要正确理解源语的文化内涵。“流利”是译